



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 欧洲奇迹

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 and 地缘政治

第三版

[英] 埃里克·琼斯◎著

陈小白◎译



为什么现代国家和经济体首先在落后的欧洲，  
而不是中国、奥斯曼或印度等其他先进文明中发展起来？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CAMBRIDGE

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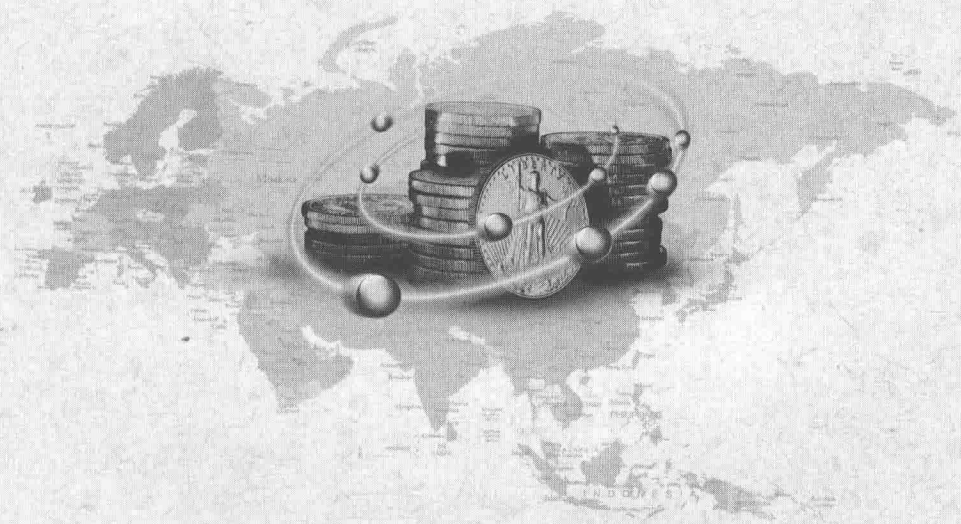
# 欧洲奇迹

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

第三版

[英] 埃里克·琼斯◎著

陈小白◎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英) 琼斯著；  
陈小白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7

(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ISBN 978-7-5080-8495-4

I. ①欧… II. ①琼… ②陈… III. ①欧洲经济—研究  
IV. ①F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0284 号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ISBN: 978-0521527835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87 © Eric Jones 2003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5)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z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5-3047

## 欧洲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

---

作 者 [英] 埃里克·琼斯 译 者 陈小白  
策 划 陈小兰 责任编辑 王敏 喻匀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7月北京第1版  
201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68千字  
定 价 49.00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第三版序言

一位毗邻牛津而居的退休农场主，过去常常耐心地指导我如何品鉴牲畜。虽然我早就把他的大部分教诲抛诸脑后了，但是我从未忘记他的一则轶事。在1904年英国中部沃里克郡的拉格比市场，一名爱尔兰贩子告诉他说：“啊呀，老兄，要是您看到不远处有一群人沿路而来，你应该到他们刚走过的路上去，看看他们是否遗落了什么。”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写作《欧洲奇迹》一书的。

本书最初的计划是1972年确定的。我至今仍保留着它。它与这部已出版的文稿相差不大，从定下计划到我1979年决定动笔写作之前的那段时期，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比较重大的长期性历史事件。早先，当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的时候，人们就已经能够感觉到，某些作者所撰写的帝国经济史逐渐褪色了，他们试图寻求的是他们自己不太久远的祖先们的世界的意义。正如唐·霍沃思在其《明亮的早晨》一书中所评论的，“遵循传统的人们，与其说是其本身所处时代的产物，不如说是久远得多的时期的产物”，他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兰开夏郡少年时代的印象”。他们了解过去的的生活，但却渴望知道是什么使之运转的。他们心驰神往于工厂制度的起源，肃然敬畏于工程领域的工业化壮举，骇然惊诧于在狭促的空间里背贴背地劳作的生灵，并迫不及待地想要领会不列颠的工业优势看起来是如何悄然失去的，于是他们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在旧的轨道上寻找，埋首于蓝皮书中研读，或者到现场勘查，然后把结果整理出来著书立说。里面不只是蒸汽机、纺织厂一类的东西。他们不只是痴迷于过时的、乏味的嗜好的人。他们也了解各种经济制度，只不过入迷于这些已然逝去的事物罢了。直到我本人在本书中谈到行会之前，我最后一次听人提及行会的时候还在读大学本科。

20世纪60年代，经济史日益俯首拜倒在技术官僚心智的魔力之下。那

是在1961年，我坐在离沃尔特·罗斯托很近的地方，一伸手便可以够着他，当时他正信心十足地向一群向来持怀疑态度的牛津听众介绍他的“起飞”概念。这个概念倒是飞起来了，即使在实践中工业化也从来就不是这样一蹴而就的。罗斯托在历史方面的知识要强于他的（经常是政治方面的）对手们给予他的赞许，但是他的论题是彻头彻尾的机械式的。把它用作常用语的人就更少了。没过多久，即使是这个“政治经济学”标签，也十分迅速地被一股甚至更排他性地利用正式理论和公开统计资料的计量经济学或新经济史学的洪流给淹没了，至少在美国如此。

与罗斯托一样，新经济史学的先驱们的研究方法比他们的追随者更隐晦。例如，约翰·休斯转而通过传记著述经济史，甚至专门休年假去研究作为美国法律基础的英国18世纪法律。可是，其他的先驱者却奋不顾身一头扎了进去，虽然作为完全建筑在一小撮经济学家的假设之上的经济理论并没有给出太多信息——原则上这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很大比例的经济学研究力量猛然冲出了大本营，对此做任何关注都被斥为“非法调查”。就这样，政治治理情况、许多经济制度，在能够获得预先消化了的统计资料之前的每一个时期（比如说大约1700年以前）以及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几乎或根本没有得到系统的对待。这个阶段见证了经济史学家把他们更广泛的史学读者和不懂行的受众赶得远远的。所以，当高等教育后来饱受财务缩减之苦的时候，这个主题没有多少支持者，就一点儿也不令人奇怪了。

这些阶段，甚至是最早期的阶段，没有一个阶段对远离主要经济体的世界各部分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非西方世界中的唯一例外是明治时期的日本，就连这一点也是作者事后想起而加进去的。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的其余部分被留给了发展经济学这一令人困惑的非史学类别，因害怕令资助机构不高兴而耻于承认过去的重要性。经济史本身仍严格局限于民族主义方面，就好像民族国家被钦定为唯一在运转的经济单元。此外，没有研究自然世界，至少没有给予它前后一贯的对待。就连我本人最初所研究的农业史，也完全是非生态性的。这个专业致力于对土地所有权的研究，偶尔捎带着研究一下宏观经济的影响。环境因素被忽略了。

正是针对这种背景情况，并本着那位爱尔兰牲畜贩子的精神，我构想出了《欧洲奇迹》。我的方法是在阅读文献时脑海中也也许带有五个目的。

第一，对欧洲整体的经历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出其一般规律。甚至在现



在，欧洲大陆的历史也很少超出连续的国别史。所谓的欧洲研究，沿着这些线路通常也仍是断裂的，就好像民族国家脱开了历史进程而凭空产生，而且现在仍是单列出来的、超越时间的和超出分析之外的。

第二，探寻自然环境在欧洲的经济发展中可能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本人对自然史很感兴趣，这影响了我对这条研究路线的选择。同样，其中也涉及把欧洲当作一个整体加以考虑，思考它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回想起来，这就涉及探讨人为的有关环境决定论的抱怨。但是一开始我就很幸运。迄今为止被经济史学家们拒斥为一个适切的知识类别的环境问题，恰好在《欧洲奇迹》出版之时被讨论得如火如荼，其原因与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活动有关。

第三，考察以民族国家形式呈现的政治安排，以及更重要的这些国家之间的功能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欧洲的经济增长。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差别，以致在罗马衰亡之后，欧洲再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帝国。

第四，避免过早地断定起始时间，避免心甘情愿乃至急不可耐地去研究工业化以前的时期。我不打算像罗斯托那样，假设经济生活一蹴而就地跃入现代性，从而使工业化国家与过去全无瓜葛。

第五，与当时盛行于经济史界的民族主义或孤立主义相反，我的一个目标是去探索某种比较标准，可以据以对欧洲发生过的事情进行评估。我对生态史和科学史的兴趣无疑促成了这个方法。科学家们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如果没有可以据以对结果进行判断的“对照物”，那就不要开展实验。这个做法飞快地引导我进入历史比较研究，有条不紊地以其他大的社会、大陆或文明作为显而易见的比较物或对照物。当然，可以说存在着与下述假定有关的概念性问题：社会所可能遵循的轨迹有的富有成果，有的不那么有成果。但是，很多反对意见则是非驴非马。有时候它们一概否认比较的可能性，这显然是因为愤慨于所谓“给予”欧洲的努力以特别照顾的行为。这样一来，它们以预先判定欧洲的任何环境或革新是否拥有过人之处为起始，以捍卫比欧洲历史上的任何情况更顽固得多的专制和贫穷而告终。

如果人们足够努力地寻找，所有这五种研究方法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都可以找到，但将它们综合起来，则是相当不同寻常的，而且显然能够引起共鸣。很少有什么批评路线能够严重侵蚀《欧洲奇迹》的大厦基础，正如我希望这个版本的“后记”能够解释清楚的那样。这座“大厦”

#### 4 欧洲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

---

也许在两个层面上不同于许多讨论“大图景”问题的著作。一个层面是，没有尝试着添油加醋，使之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完整叙述，而是去粗取精，通过引经据典，设法增添少许的历史可信度。另一个层面是，不夸耀任何单一的解答可以说明问题。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没有发现任何这样的情况，而且我不相信如此复杂的历史进程可以如此简单划一地加以说明。也没有哪一位致力于这类研究的自然科学家曾这样说服我：在物种或全球层面进行描画（我完全拒绝不了做这种尝试的刺激）而损失历史记录中的细节或排除其偶然性，其获得的好处是值得的。因此，接下来的文本密集而厚重。关于第一个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大陆的成就，其他任何方式都是不可能实际地描绘出来的。

## 第一版序言

奥斯卡·王尔德与圣彼得约好在天国之门见面。圣彼得抱着一堆装有华丽封面的书对王尔德说：“王尔德先生，这些是你未成文的著作。”我经常感觉《欧洲奇迹》最终也会是这样的结果。作为一项叙述性的任务，这个主题要求进行海量的阅读；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挑战，它令人望而生畏。然而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它又给人以补偿，这在我的研究旅程中对我是有益的，而且某些相关材料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甚至于那些流动的提供乡村图书馆服务的带篷货车中。我的确要感谢三个大陆中许多图书馆的管理人员，而且由于绝不可能在一个地方找到所有的材料，所以尤其要感谢那些参与了慢如蜗牛的馆际互借计划的人。

除了便于携带，在我看来，就经济史的健康发展而言，重要的是，更多的业界践行者应该试着用从我们个人的研究中煅烧出来的种类多得令人困惑的“砖石”，冒着少许“砖石”掉下来砸到专家脚趾的危险，去建造经济史“大厦”。近期许多作者的著作已经表明了，人们对极长期历史 [ 罗纳德·马克斯·哈特韦尔 (1969) 最先使用该术语 ] 又有了某种兴趣。这些作者中属于职业经济史学家的不太多，而且我认为我们太应该试着去影响更广泛的受众了，如果我们相信把我们的工作合在一起而能发表出有价值的东西的话。下面就是我本人对欧洲的极长期发展的解读，特别是关注了大约 1400 ~ 1800 年这一时期以及与亚洲的比较。当时出现在欧洲的体系，对于该大陆的历史，对于作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拉丁美洲、南非的发源地，以及对于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大量事件，具有显著的重要性。

我并没有寻找一种优雅的决定论或历史主义模型。对这类模型的批评似乎太猛烈了 (例如, P. T. 鲍尔, 1971)。我也没有不可避免地把经济结果只归结于纯粹的经济行为选择。促使欧洲经济体系成型的关键影响因素, 似乎



是在一个有利的自然环境中所做出的政治决策，这种环境给出的是一个方向而非准确的演进次序。经济行为的选择必须在这种演进框架内加以研究，至少对于所讨论的时期而言如此。简言之，欧洲似乎拥有环境优势，虽然这些优势并不能保证出现特定的反应乃至任何反应，但是亚洲因没有这些优势而使那儿的发展更为困难。然而，我并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即亚洲各个部分要自发地产生工业化，甚至于在欧洲之前产生，那是绝无可能的。这实在是太困难了，而且可以有充分理由相信，甚至在沦为殖民地以前的时期，这在亚洲大陆变得越来越困难。亚洲人生活在糟糕得多的并会造成经济扭曲的压迫之下。只有欧洲设法实现了削减“专制权力”这一政治上举世瞩目的壮举，从而减少了风险和不确定性，鼓励了更多富有成果的投资，促进了增长。

如果我要寻求一般的历史理论，而不顾那些认为这是学者之幻想的论点，那么，我就应该进一步向前追溯，对旧石器时代以来很长很长时期的世界进行考察。人作为一个成功的物种，其经济史可围绕着由麦克伊韦迪和琼斯（1978）所提出的人口大周期、交叠的人口大迁移以及根本的农业进步等观点明确地表达出来，这种经济史的前景是令人激动的。在这个层面上，将会有一类现象可用以得出一般规律，并可据以对自主创新的文化的经验进行检验。但是，若说欧洲持续经济增长的成就导致最初的工业化——按照定义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情况，那就不会有任何这样的现象类别，也就不会有适合所有情况的適切理论。这就必然导致史学方面实际的倒退，从约翰·希克斯爵士（1976）以及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1973）向历史深入推进的暴露出的外垒倒退回去。由于所有这些概念上的困难，任何已经就类似的主题著书立说的作者一定热切盼望有人把他的著作当作“垫脚石，以便更好地前进”。当前，在缺乏一般理论的情况下，我发现比较的方法能够提供一种控制胡乱推测的手段，并给予某种既见森林又见树木的希望。因此，我着重强调了欧洲经历和亚洲经历之间的比较和对照。

埃里克·琼斯

于哈塞尔伯里市普拉克奈特镇，萨默塞特郡

1980年1月

## 第二版序言

本书的主题是一个大主题：为什么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始于欧洲？毕竟这些更有可能出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因此，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技术变革、结构变化和收入增长是如何全面开始的，也就是说研究的是位于经济史核心的一系列问题，还涉及在地理位置方面（在自然环境和政治社会的地区差异意义上）影响了经济变化形态的范围内的历史地理学，因而进行了与欧洲以外地区的比较，以图考察欧洲的情况有何特别之处。

面对如此宽广的历史画卷，即，涉及世界四分之三人口数百年的经历，并迫使我们依赖于二手的资料来源，所以我们应该准备去考虑各种各样的解释。从这一尺度看，尚没有任何完全令人满意的、无可争辩的理论。对这一或那一计划的反对者们激烈地宣称他们的计划才是最终答案，这种激情表明社会科学史仍是不成熟的，业界的一些践行者尚不够成熟，因而不敢承认与各种难以经受得住某种决定性检验的假设有关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就排除那些可能有局部解释力但却缺乏广泛应用的解释而言，比较历史似乎与其说是一种预先确定的方式，不如说是宏大的理论。如果我们将自己局限于研究某个单一的经济体，我们可能很容易以偏概全，误把它的特质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历史学家通过聚焦于某个单一的国家而能达到的研究深度，会彰显这种危险。诚然，正如一位评论《欧洲奇迹》的人士所抱怨的，比较研究并不保证我们将能确切说出“鸟是被哪颗子弹击落的”。唯一能够这样做的方式是着手研究一种预先确定了何者是关键变量的理论。比较所应该做的，是排除大部分的射击模式（采用了相同的比喻）。不管怎样，假设任何单一的因素或关系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无所不能的影响，这是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理由都没有的。正如他们所言，我们将保持镇静、不急不躁。本书是一种解释而非绝对的真理，它始于这样的假设：任何

显著的历史演进都有一定的成因结构。然而在本“序言”中，我将根据自己就这一结构所绘制的原创图，提及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次要变化。

### 何者、何处和何时

典型地，对增长的历史研究力图辨别出人均实际收入的上升是怎样开始的——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上行趋势的成因。这个研究方法往往直接追踪各种推定的收入的变化，而刨去在变化之前并促成了变化的环境因素。在现实中，任何持续的人均收入增长都不大可能开始于一个停滞的、不变的经济体中。把注意力集中在刨去了其发展和结构转变之母体的增长上，是徒劳无功的，尤其是当几乎没有关于早期国民收入变动情况的数字的时候。

关于为什么在现代经济学家认可为真实数据的层面上，所合计的数据即使有也是很少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纵观大部分的历史，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相反，民族国家是欧洲人在我们所感兴趣的那一时期的一大政治创举。更早期的经济变化必然指的是各种不同的地理单元的。历史统计资料绝不是没有，尤其是那些关于税收和价格的，但是我们缺乏的是整体经济层面的历史统计资料。20世纪之前，甚至没有几个社会进行过人口普查。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去发现各色各样的、间接的经济变化指标，并把它们调和起来。

整个社会的（或其成员“平均的”）收入增长也许在相当早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一些主要权威人士声称远在公元1000年，欧洲的平均收入就在上升，虽然这种上升在起初肯定是慢如蜗牛的。实现经济增长是解决因人类的需要而导致的急迫问题的手段，因而事关重大。“未实现经济增长对于不计其数的世界人口来说意味着持续的贫困、疾病、肮脏、堕落和长年累月的摧毁灵魂的苦工”（贝克曼1974：3）。若我们通过讨论各种模糊的、长期的、有统计资料之前的、集合的运动，来研究处理这个主题，就像我们在这里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像是在书写与民族个体的经历相去甚远的历史：非人性化的历史，有人这么称呼之。但是考虑一下，如果我们走到另一个极端去写作传记，那么可以预期，我们将要探究的只是少数几个人，更糟的是，我们根本没办法断定所选择的主题是否具有代表性。人类的挣扎求存不管是痛苦难忍的，因为有着很多这样的奋斗。历史学经常被指责“冷酷无情”，而历史学家往往会反驳说社会统计数字就是冻结了的血泪。大尺度的历史就

很有意义，不像乍看起来那样不近人情。

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漠视。（把这看作是一个要事先办的问题也许更为公平。）实际上，本书强调的要点之一是，到18世纪，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已几乎成了欧洲各国政府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最有意义的是这里归类为灾害管理的行为。特别地，其中包括了强制隔离以终止流行性疾病在人群中间传播、设置防疫封锁线以防止受感染牲畜四处乱跑、向受感染牲畜被宰杀的农场主支付赔偿金，以及采取紧急措施，把谷物盈余投入到那些因高昂的物价而可能产生饥荒的地区。在贫穷而脆弱的社会，从诸如此类的行政措施中得到的收益是巨大的。向因为牲畜与患病的动物有接触而被屠宰的农场主支付补偿金，这显示了在18世纪的行政管理和农人生活方面，一幅与过去通常所描绘的完全不同的景象。

结果，欧洲在防止或应对灾害的政策领域方面，把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远远抛在后面。各种相反的主张（王氏和珀杜1983）并不成立，因为它们依靠的是威尔（1980）所发现的中国满清初期各种不同寻常的饥荒预防措施这一证据，而忽视了大的背景：饥荒只是一种灾害；中国不是亚洲；而且在欧洲的竞争力变得如此明显的时候，甚至连中国的反饥荒措施也黯然失色了。

公共产品被定义为这样的产品：没人能被排除在该产品的使用之外。由于这个非排他性原理，欧洲各国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史无前例的范围和规模增进了全体人口的福利。这个关于欧洲穷人福祉的含义在历史文献中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其重要性应该针对适当的标准，即中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标准以及直至最近时期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标准。可能有人反对说，对穷人所征的税收跟反灾害措施所支付的成本不成比例，但是某些公共产品对于生命和健康如此重要，乃至通过征税以获得这些公共产品的“强制储蓄”都会是一个积极的步骤。

可以把经济发展看作是涉及收益之前的变化。发展隐含着因农业就业人口下降而导致的经济结构变化。这首先伴随着农场或农舍中兼营性制造业的出现而发生，兼营性制造业是一种隐蔽的结构变化形式。这个“原始工业”部门制造了可供销售的物品，相应地，在专门为这些农舍工人生产粮食的农民中间，创造了吸纳这些物品的市场。

现代研究的确表明发展和增长携手并进，因为结构变化明确地与收入增

长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联系并不是十分密切，对于发展来说，除结构变化外还有其他方面。其他早期的方面包括投资于修建道路、桥梁和港口，投资于江河与运河航运，从而使散装货物有可能广泛地分布于整个欧洲大陆。此前，任何规模的批发业务往往局限于地中海盆地、中国的某些水道、日本海以及（更多的是期望中的而非实际上的）“印度尼西亚沿海地区”。在这一切中，我们必须看到，欧洲人既不是仅有的也远不是第一批活跃的贸易者。世界各地的贸易活动，其差别都是程度上的，而没有质的不同，而且欧洲发展中的许多特征是一类相当晚才定居而追赶领先地区的区域的特征。促使欧洲表现突出的，是长距离批发业务的膨胀性发展，这些业务是多边的、日常商品的批发，而不只是过去在长距离贸易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奢侈品批发。

由于缺乏统计证据，我们无法轻易发现早期贸易史中的转折点，因此，我们对于经济变化史的解释不大可能是清晰明确的。经济是错综复杂的事物——现在有一篇文献承认，用生物类比而非通常的机械类比能更好地表达经济本质。经济以各种各样变化多端的方式涉及社会生活的其他特性。其挑战并不是关于把注意力固定在经济增长上的挑战——这只是在近期才变得迅速而且是可度量的，而是对于将那些先前的发展与平均收入的最终上升联系起来进行判断的挑战。

密切相关的一个现象是市场的一体化，包括地方性的、价格隔离的市场的最终形成。欧洲的商品市场早早就一体化了，但是虽然这实属必要，却明显不足以产生十分显著的增长。中国长期以来就拥有一体化的市场，人均收入却没有任何持续的上升。伊斯兰世界也会接受单一的货币。印度莫卧儿帝国的银行系统能够承付汇票，这些汇票一度可用以收买正在起事反抗莫卧儿帝国的马拉塔人，就像（用欧洲人的术语说就是）丹麦金<sup>①</sup>那样。然而，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复杂精巧的做法并不足以带来大的增长。

尽管如此，最基础的变化可能仍在于市场的形成，但是与其说在于商品市场，不如说在于土地和劳动力市场。除大宗商品市场外，欧洲还另有成就，那就是非常高效的能够交易土地和劳动力的要素市场的形成。这要求纯粹接受大量的货物交易之外，各种文化和政治刻板现象有着更为深远的消除，从而引起更为深远、危险更大的社会变迁。有人提出，这是由于难以度

<sup>①</sup> 中世纪时英王为了进贡换取和平而向老庶民额定征收的税。——译注

量某一租户或工人的边际产品或监控他的努力，而使成本更加高昂所致（波斯纳 1981：181 注 12）。然而，这似乎跟考虑如何占用这边际产品——也就是说，与权力关系——有着同样大的关系。

经济表现的历史跟所要研究的地理区域和确切时期的选择关系密切。何者、何处、何时这个三合一的问题，通常由下述几乎不假思索的假设来回答——解开戈尔迪之结：经济史中真正重要的是发轫于 18 世纪的英国并向外扩散的“工业革命”连同帝国主义的传播，后者被认为仅仅是一个西方现象，而且是完全消极的。“一开始英格兰崛起了。满意从世界消失了”（伯利纳 1966：159）。由于这个倾向，我们关于变化潮流的观点就有断章取义之嫌，而且对于前工业化时期和前殖民地时期的世界的演变，也变得难以做心平气和的辨别和评价。

地理问题一分为二。首先，是所研究单元的适当规模的问题。其次，一旦这一点已经明确，就是选择恰当的所要研究的历史实例问题了。主要的竞争性单元是地区、民族国家以及有时候与文化区域或文明有几乎同等范围的帝国，民族国家是这些类别中最流行的但却最不适合的一类。它们是欧洲历史进程中人为的产物，是由一堆杂七杂八的封建碎片锻造在一起的。它们在有理由去寻求早期发展经验的时期尚未完全成型。一句话，它们既不合时宜，也不合地宜。自 1945 年以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所以它们并不能囊括或涵盖欧洲以外地区整个相关的历史经验。

经济活动更有可能是地区性的，而且，注意到在最近这些年，经济史学家对于地区的再发现被大肆吹嘘就像是一个原创性的发现，这是耐人寻味的。然而，地区提出了几乎不可克服的界定问题（有人曾经把它们拒斥为地理学者所使用的形而上单元）。需要根据它们所包含的并且经常充当其笨拙替身的经济活动的命运，对它们进行持续的再界定。这使地区成了向其中注入历史的靠不住的载体，因为历史必然是纵贯各时期的变化的，而地区性的集合体在这各个时期可能是不稳定的。深一层的困难在于，地区并不独立于更大的或与之重叠的政体。尤其是，虽然按照生态地区对农业做了相当有益的讨论，但是不应忘记，这些生态地区仍然受制于诸如被不一致的单元征税一类的政治影响。

结论有可能是，我们需要多元的地理单元，而这些地理单元是难以辨别或找出特定的实践中的证据的。这个稍显纠结的问题在我看来似乎堪比历史



分析中的综合问题——何时开始的问题。毫无疑问，在这两种情形中，通情达理的解决办法是选择最便于人们想到的分析的时间和单元，尽管由于对时间和地理的设定可能会任意限制人们所能预期的答案，那么不让自己变成最初的选择的俘虏就很重要了。历史研究的确经常受害于这个方面，因为历史学家把自己界定为研究时期和地点而非问题的学者。他们依据所要认识的特定事实的工作量，而对这一点加以合理化，这是足可理解的，但这么做经常会束缚他们对问题的思考。

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所提及的第三大类即帝国，是最适合讨论的单元。我们的确要意识到在各种次级单元中相互矛盾的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同时也要补充考虑在欧洲的情形中所出现的帝国替代物。这个替代物就是诸国体系，其共同的进程同时影响着其中的民族国家和地区。

对增长史中的研究单元的选择，传统上一直是民族国家，其中，所选择的世界第一个部分就是不列颠。最大的思想团体仍然是我所称的“小英格兰主义者<sup>①</sup>”学派，尽管它后来发生了一次分裂，带来了其在最关注的单元方面的变化。该学派暗示，英格兰或不列颠过去是或者变得如此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以致她也只有她才能孵化出工业革命。思想上的这种偏狭已经或者本应遭到来自近期有关法国的研究的当头一棒，研究表明，法国的成就堪与英国18世纪的许多成就相媲美。在欧洲的背景下正视英国经济史，而不是坚持认为罗马天主教教义和木屐均肇始于（法国）加莱，这看起来几乎是英国学者甘心接受欧洲共同市场的一个结果。即使如此，仍然有一个坚决得令人惊讶的民族主义反对意见。小英格兰主义者过早地对经济变化的时间确定问题做出判断，断然假定一切相关变化都采取了后期的和明确的工业化的形式。这个观点的不幸在于，如果不列颠真的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她的历史就不可能帮助人们理解其他国家的经历，更不要说那些在其后的工业化进展迅捷得令人生疑的邻近国家了。把不列颠看作是受到作用于整个欧洲大陆的力量影响，这更有教益得多。她在棉花加工和冶铁的技术变革基础上，好不容易才从欧洲大陆中脱颖而出，登上了第一工业大国的宝座。

处在另一个极端的是“世界大同主义者”。他们似乎是伊曼纽耳·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的世界体系学派的一个延伸，几乎是后者的一个间接证明。

① 尤指19世纪反对大英帝国对外领土扩张的英格兰本土主义者。——译注

原先的世界体系观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该体系被设想为受到一个由西北欧各国构成的剥削性核心所驱动。这个大经济地理学代表了一种解放性的转变，从不列颠或欧洲内在论者的作品中摆脱出来，虽然这个关于核心、半外围和外围之间剥削关系的核心假设经不起独立学者们的关键检验（例如，奥布赖恩 1982）。思想列车完全被世界大同主义者带出了轨道，他们争辩说，所有后期的前现代经济体均被跟欧洲所做贸易的涟漪效应所渗透，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内部的考量，决定了非欧洲世界的命运看起来是黯淡的、令人沮丧的。

毛泽东指出，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小鸡，但是温度并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内在根据是不同的。所以，受欧洲的贸易和侵犯所影响的，是各个非欧洲的经济体。它们是根据其自身的组织和环境，而不是根据欧洲下手伤害它们时的凶猛而做出反应的。

不论如何，1800年之前的时期——这是本书研究的时期，中东和亚洲大部，特别是中国，是没有受到巨大的欧洲影响的。一位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曾说18世纪是亚洲人的世纪（范·勒尔 1955：271）。一位土耳其历史学家评论说，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受国际军事竞争对手而非由商业和市场关系这样的玩物影响的自治结构（苏纳尔 1980：574-575注2）。通常认为第三世界经济体的命运一直以来被西方帝国主义者弄得更加黯淡，这样的假设不论如何都是没有根据的。劳埃德·雷诺兹（1983；1985）收集了相当多的证据，证明许多这样的经济体正是在19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成长壮大。

似乎没什么理由认为，地理上相距遥远的但通常稀疏的、最终都返回欧洲的贸易合同，是使整个前现代世界运转的因素。的确，某些遥远的影响早已为人所知，例如北美东海岸的皮货商所引起的远至西方的扰动而造成的连锁反应，但是，影响已经减弱的合同跟世界市场是不一样的。世界大同主义者往往回避在对论点可能起决定作用的量化方面做出努力。他们的论点本身现在已不时新了。地缘政治家哈尔福德·麦金德被指责忽视了居住在（几乎）被克虏伯发现的大陆上“没有历史的民族”的经历。然而与麦金德一样，我们并不需要去研究整个世界，以理解欧洲发展的早期阶段，甚或提供足以与欧洲的经历相比拟的对照物。因为麦金德的传记作者在其辩护中做了疯狂但却有效的反击，坚称欧亚大陆板块之外的确有人居住并创造了历史，这就好比在说橱柜因为里面充满了空气而不是空的一样（帕克 1982：234-5）。诸如此类的考虑引导我把欧洲经济的兴起与（欧洲）近代早期或前工业

化后期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背景做比较。关于主要经济体，我们把它定义为在单个政体内有组织的非常大的人口。麦金德探究的是力量的分布，而不是文化；而我们所探究的是主要的经济变化，而非边缘的文化或无名的贸易渠道。小型社会在人类学上是令人感兴趣的，它们能够提供特殊的机会去研究在实质受控的条件下的经济行为，但是根据定义，它们并不是世界史中的重量级选手。起而掌控大局的是欧洲人，而最重要的是，开展大宗商品贸易——主要是彼此之间的贸易，这一点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欧洲人。

根据我们的目的来说，合适的研究单元应该是欧洲的诸国体系和同时期的各个大帝国。诸国体系是一组相互作用的国家或地区。由各民族国家更不用说各地区组成的结构，当然会影响经济表现，但是相对于一个具有共同的文明、彼此相互作用的政体和超国家市场的系统性影响，这是第二位的。欧洲在经济和政治上同样关系紧密。要获得对这个诸国体系的整个经济更好的理解，可以将它与当时的其他大型经济体进行比较和对照，这些经济体坐落在亚洲，至少是在亚洲和中东，被组织得就像它们处在政治帝国里面一样。它们各不相同的轨迹——均在欧洲的近代早期最终向下滑落，无法由西方的帝国主义来解释。这里要指出一种不同的帝国主义，那就是由来自中亚大草原的诸王朝所实行的中央管制经济。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和满清帝国，它们全都是蒙古人左冲右突、纵横捭阖的近代典范。正是这个，而不是长期有效的亚洲生产方式中的水力农业，也不是西方的贸易或征服，决定着东方的命运。大草原帝国主义才是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源，它把“近代早期”伊斯兰世界的中东、印度和中国传统的农业和新生的贸易部门，自私自利地置于它的掌控之下。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大约 1400~1800 年这一欧洲“漫长的近代早期”的这些问题呢？欧洲增长的强力蓄势阶段肯定出现在早前，而且如果我们要去注意已为各东方社会所展现的潜力，那么各个较早的时期也需要一瞥，本书的确提到了前述这些时期，但关注的是欧洲的加速以及变得显而易见并一举超越所有其他地区的时期。这一时期使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查看那道“分水岭”。

对分水岭的争论是一场寂静无声的、不事张扬的、犬牙交错的斗争。关于欧洲一骑绝尘的时间，各种各样的权威人士纷纷发表或坚定或激昂的评论，不论他们有没有将欧洲与亚洲的经历进行了对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各